

第1版
2009年第4期 总第39期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USA)

世界文化論壇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 1540-2339
地址: P O BOX 2007
Claremont, CA 91711-8007
網站: www.postmodernchina.org

现代农业的弊端及其对策 (中)

[美]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治河博士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以上谈的是西式现代农业的弊端。由于中国是后发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基本沿袭了西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尽管五四启蒙时代的“全盘西化”的口号今日不再出现在关于农业发展的主流话语中，但在许多方面，我们基本上照单全收了西方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因此相应地，也开始品尝到现代农业的苦果。

1.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成就与代价

当然，没有人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农业发展方式方面，实现了农业发展由粗放生产向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粮食已自给自足，已不再需要联合国的救济。美国人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担忧破了产。“但愿苍生俱饱暖”这一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理想，“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

但毋庸讳言，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代价之一就是土地资源的严重污染和伤害。在我们追求农业企业化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将整个环境成本外部化，因此带来了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沙漠化、“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据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副司长叶兴庆的分析，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大量消耗物质资源，增长方式相当粗放。据调查，目前我国化肥年施用量占世界总量的30%，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化肥、农药的利用率仅为30%和40%，比发达国家低一半。

其结果就是“白色污染”成为农村的一大灾难；过去的不少青山绿水变成了光山污水；不少地区沙漠化严重。在许多城市，大气污染严重，人们已很少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在资源方面，由于一些地区多年来乱开乱采，加之大量浪费，致使资源枯竭。至于江河或者断流，或者发生大洪水，都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直接关系。

代价之二就是农村社区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日益严重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就是一个重要表征。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村强社年劳动力的外流，出现了经济意义上的“空心村”和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相互交织的“空心化”现象，严重影响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空心化”不仅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而且严重损害了农村人的家庭幸福。“家庭的温馨与欢乐越来越大越少，农民的家庭生活已经变得非常常态化。”

虽然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并非任何代价都是不可避免的。以牺牲8亿农民为代价的发展未免过于残酷了。一个以牺牲广大农民的幸福和自然的健康为代价的农业发展模式是成问题的，甚至是荒谬的。它是“物本主义”登峰造极的结果，是与“以人为本”的宗旨相背离的。

那么出路在那里呢？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最快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农民从农村弄出来，让他们在城里干高收入的工作。”这一西方专家开出的美式药方在我国被不少人视为灵丹妙药，受到许多人的追捧。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人多地少是我国将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政策建议，都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思路被认为是“破解困扰中国崛起的“三农”难题的不二路径。”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华山并非一条道”，美国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未必适用于中国，美式药方并非灵丹妙药。它在菲律宾的失败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

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菲律宾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

在这一过程中，菲律宾的农业现代化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1) 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城市问题；2) 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工人问题；3) 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社会问题；4) 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政治问题；5) 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国际贸易摩擦。

这五大转变可以说是菲律宾机械照搬美式现代农业模式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正是因为这五大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从而使菲律宾由昔日的“亚洲典范”沦为今日的“亚洲病夫”。

2.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之路

目睹现代西式农业在西方造成的严重负面效果，有鉴菲律宾农业现代化的悲剧，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求走出第三条路，发展超越西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

中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物质生活的提高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精神生活；发展生产力是必要的，但不能破坏生态环境；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必须保护生态环境。中国政府“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战略转向。

因为人口基数的庞大和资源的严重短缺“中国不能再重复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老路”。要利用信息革命带来的契机，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既要利用工业文明的积极性、建设性的成果，又要避免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灾难，为我国众多的人口营造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生态需求，为地球的可持续存在和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生态文明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它将引领人类放弃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重功利、重物欲的享乐主义，“摆脱生态与人类两败俱伤的悲剧”。

后现代思想家认为现代“功利主义”因其短视和道德缺陷已经落伍，或者至少是“不恰当的”。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来换取一时经济繁荣的做法日益不可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践活动将成为全球性的时代潮流。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生态农业必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尽管这是个“极为艰难的选择”，但却是一个势在必行的意义重大的选择。因为就连美国农业自己也“在变”，中国就更没有必要墨守成规，抱着西式或美式农业不放。

3. 两型农村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现代农业说“不”

“两型农村”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既是这一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这一探索的进一步深化

将“两型社会”应用到农业，于是就发展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两型农村”概念。

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资源节约型农村是向过去那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告别，从而转向“低投入、低能耗、低

污染、高产出”的发展模式。

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农村，就是要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指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因地制宜的规划、组织和进行农业生产。它是对技术含量高、资源利用效率高、物质投入浪费严重，以农药、化肥、能量大量投入使用为手段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石油农业的摒弃。生态农业以保持和改善系统内的生态动态平衡为主导，合理地安排物质能量在系统内部的循环利用和多次重复利用，以尽可能少的（燃料、肥料、饲料和其它原材料）输入，以求得尽可能多的（农林牧副渔产品及其加工制品）输出，秸秆还田、畜粪还田、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生物防治等耕作制度和生产方式得到了充分利用，从而获得了生产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能源再生利用，经济效益增加四位一体的综合效果。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由环境友好型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组成。主要包括：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人人关爱环境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

“两型农村”建设涉及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在农民群众中积极倡导勤俭节约、文明朴实、卫生环保的生活习惯，强调生活中的低能耗、低排放、再利用，积极发展农村绿色、环保、节能产业，大力推广太阳能、风能、小水电、沼气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尽可能的利用生态循环方式处理生活垃圾和生产废弃物，充分利用生活居住空间和交通道路两旁的土地植树、种菜、养花，增加绿色植被的覆盖率，真正使农村体现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风光及生活聚居的相对优势。

这意味着，以招商引资为引擎的增长方式和在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已受到质疑，过去“村村建工厂、家家点火”的乡镇经济发展思路已经不再被认可。“太湖污染风波”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神经，人们开始意识到，工业化不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不是每个县每块地都要工业化”。那种忽略发展成本甚至不计代价的非持续性发展模式，正在日复一日的受到来自民间和中央高层的双重夹击。风行14年的“百强县评比”在不久前的黯然落下帷幕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志。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学家杜志雄先生的事后分析，“面对科学发展、和谐、民生、生态等全新的发展理念，既有的百强县评比，已经不是中国县域经济的‘真实照片’”。因为一个以衡量县域GDP为主的排名方法，充其量只是说明百强县在财富创造方面是基本成功的，反映的只是经济发展这一有限领域的情况。他进一步指出，现有标准下先进的百强，换一套新标准可能就是“落后”。这无疑挑战了“GDP胜利者不受谴责”的神话。

与现代农业把经济发展和GDP摆在首位，把迅速致富作为头号目标不同；后现代农业把人的幸福指数放在首位，重视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在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达利和柯布看来，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共同体”的发展和繁荣，在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或者用杜志雄先生的话说，在于“切实提高当地所有阶层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利水平、幸福感以及对赖以生存的土壤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因为后现代农业把“广大农民的利益最大化”和“社会与环境代价最小化”作为“进步”的首要标准。

在我看来，中国的“两型农村”概念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后现代因子的概念，是一种后现代农业的雏形。（未完待续）

本期主要内容

现代农业的弊端及其对策 (中)	第1版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农业	第1版
期待中美未来五十年的合作	第1版
伟大的二重性格	第2版
我们骑车去	第2版
赵紫宸：一个拥有多元视野的中国世界公民	第3版
直击印度有机农业	第3版
中国，你做好准备了吗？	第4版
陪德国客人看中国农村	第4版

过 程 视 角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农业

——“两型农业与生态农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农业现代化比较国际研讨会侧记
董慧 博士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长沙市人民政府、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和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两型”农业与生态农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农业现代化比较国际研讨会于2009年11月7-8日，在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长沙市宁乡县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越南等国的专家和全国的学者大约150余人欢聚一堂，为现代农业把脉，共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农业与中国特色的“两型农村”发展问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朱有志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宣读国家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贺信，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长沙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剑飞致欢迎词，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致辞，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黎力峰讲话，中共长沙市委常委、副市长张迎龙介绍长沙市两型农村建设与生态农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下转第2版）

黎春秋介绍宁乡县两型农村建设与生态农业发展情况。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赵阳，美国加州科技大学农学院院长莱斯特·杨 (Lester C. Young)，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刘学林以及长沙市、宁乡县的部分领导出席了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湖南日报、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长沙晚报、长沙电视台、星沙之声等十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期待中美未来五十年的合作

——发展基于多年生农作物的可持续农业

[美] 韦斯·杰克逊 (Wes Jackson) 周邦宪 编译

一、50年农业规划

工业革命的历史才刚刚两百年出头，农业绿色革命就于1959年初露端倪。三十年内，一些主要作物的产量在有些地方就翻了翻，在另一些地方则增加了三倍。石油给运输和其它机械活动提供了燃料；天然气提供了为作物施肥的氮，实现了植物培育者所预期的潜在产量；每英亩亩式耳量或每公顷公斤量的增加都受人称赞；食物供应的增加，以及抗生素和其它药物的出现，使得死亡率大大降低；世界人口翻了一翻... 由于所有的这些成功，可称为工业化思想的东西如今已渗透全世界。

虽然矿物燃料消耗增加，然而却只有不多的科学家在思考它所释放的碳使生物圈付出的代价。但是，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变暖是一天公害。

要解决能源和气候的危机，就需要在政策上下非凡的决心，既要维持能源，又要发展更新能源的技术。我们可能会成功。然而一旦土地遭侵蚀，任何技术都不能制造出替代物。尽管我们至今为止已作了很多努力，但土地侵蚀和其它的土地退化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却在增加。在一些地方，人们实行最小量耕作农业，或无耕作农业，致使土地受蚀情况有所缓解。但随着这一所谓的解决方案而来的却是杀虫剂的增加：我们是在为了挽救土地而毒化土地！

我们不妨认为，对于我们两个国家来说，食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那么，如要谨慎，我们首先应认识到这点：在自然的所有生态系统中，常年植物都是以混杂种类的方式生长的，而且它们保持土壤。而农业

则以每年的单作取代之，因而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颠倒了该过程。结果，生态系统的作用（包括土壤的肥力）退化了。大多数的可用土地，其质量都到了临界状态，而且还在迅速下降。这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而土壤受侵蚀所得到的关注则较少。

所以本文论的目的是，提出一种新的见解，以尽量减少潜在的农业耕作。为了达到该目的，我们这里的土地学院主办了10次会议，参加者有从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的农民，以及一些可持续性农业组织的代表。这一松散联盟的目的就是要帮助造就更大一批支持者。

有机-本地食品的诸组织，包括我们这个联盟中一些成员，提出了他们的见解，提出了培训方式和更具可持续性的种种模式。我们与那些人有共同的原则和目标，那就是把世界上生产粮食的大地，恢复成多年生植物的轮作，以生产粮食。“绿地蓝水”是上中西部的一个联盟。它提出，有必要将密西西比流域造就成一个常年无土壤侵蚀和氮流失之虞的地方。这两种情况是造成世界上最大死亡地带之一的原因。该联盟的成员包括伊利诺斯大学，依阿华州立大学，还有可持续性农业利奥波德研究中心，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奥杜邦协会，伊利诺斯服务人员联合会，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土地学院，土地服务人员项目，明尼苏达-依阿华农民联盟，自然资源保护组织，“鲟鱼无限”河流与渔业保护组织，依阿华在地农民联盟，以及乡村优势及农业分水界研究所。

要造就有条不紊的变化，我们认识到需要承担起一个长期的义务。我们把它称为“50年农业规划”，该规划提出逐渐地、按部就班地改变农业。也许我们一直缺少的是在科学上有根据且又可行的远见。我们只知道，要贯彻这个计划必须得到农业部长，总统，国会，非营利组织，各种公司以及公民的赞同。

二、计划与成本：以生态为标准

后面的图表演示了10个农业发展5年计划。每一个5年计划除了要完成它现有的资金、粮食任务之外，还要赶上“50年农业规划”的总目标，即制用于粮食生产的生态资金的赤字开支。于是，“50年农业规划”就成了为用来增加可持续性和食物保障的工具。

短期内，通过鼓励农民用四季常青的草与豆科植物轮作的农业政策，我们便可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但是，那是远远不够的。一旦有了多年生粮食作物，农民的选择会大大增加。随着土地的受益，他们的投入成本会降低。我们承认，美国农业部和其它研究者将需要政策来维护基金。要把我们目前的大量粮食作物培育成多年生的，这需要时间。尽管如此，在堪萨斯，近几年来，已有了一些不错的样板。随着产量的增加，它们会取代它们的那些一年生的相对作物——其中一个仅仅十年内就可被取代。

我们的项目将把生态系统用作标准。一旦那一标准被采用，一系列的技术就可成为有用的工具。是技术服务从人的远见，而不是技术引导人的见解。土地学院将给此项目免费提供胚质以及30多年研

究多年生作物的经验。这十年里，它的成员已大大地提高了作物的多样性以及变化的速度。我们有多年生小麦、高粱、向日葵以及其它作物的杂交原型（见附录2）。我们将给人们提供来自一种多年生小麦（被命名为Kernza™）的少量的面粉样品。生化分析表明，这种多年生小麦在营养上胜过一年生小麦。人们喜欢它。我们期望十年内普及到农民。

三十年来，我们与几个政府授予土地的大学和其它一些机构协作。我们把它们视为宝贵的合作伙伴。由于所需的改变是循序渐进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我们国家应由美国农业部来牵头。在中国，必须确定在何种层面上进行这一工作才是合适的。奥巴马政府热心改革，这就使得我们的建议在美国似乎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建议，在8年内联邦基金资助80位育种专家和遗传学家，使之培育出多年生的粮食、豆科和油料作物；30位农业和生态科学家，让他们制定出必要的农艺制度。他们将在不同的地方研究6或8种主要的作物。按每年每位科学家按40万美元用于他的工资和研究，这笔支出每年不会超过5000万美元。根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项调查，这仅仅占公共和私人部门在育种研究一项上花费的百分之八。

三、彻底改变生态破坏

我们的看法立足于这一前提：必须制止对生产粮食的耕地的生态破坏，诸如土地的侵蚀，杀虫剂对土地的毒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要做到这点同时又要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最有成本（下转第3版）

征 稿 啓 示

《世界文化論壇》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美國）主辦。面向兩岸三地及美國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增進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福祉。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華人明星錄、信仰的天空、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那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那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歡迎兩岸三地、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踴躍投稿。稿件最好控制在1500字內。潤筆費千字10-20美元。歡迎兩岸三地、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踴躍投稿。稿件最好控制在1500字內。潤筆費千字10-20美元。電子稿件地址：ipdclaremont@yahoo.com 網址：www.postmodernchina.org

《世界文化論壇》報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任 平 成長春 劉李廷 曲躍厚 李晨陽 李惠斌 陳俊偉 吳國盛 陳榮灼 嚴 捷 楊富斌 劉笑敢 金惠敏 歐陽康 俞懿嫻 顧林玉 唐力權 鞠寶凡 安樂哲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樊美筠
編委：王治河 王蓉蓉 朱易 倪培民 唐崇昭 謝文郁 曾慶華 黃勇 馮毅 鄧樹宏
顧問：葉秀山 朱德生 周桂鈺 樂黛云

伟大的二重性格

北京大学 孔庆东 教授

圣像一旦熄灭了光环，得到的决不是褒扬，而是真正由衷的敬仰和礼赞。鲁迅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圣像，而今，越来越多的探索者，从膜拜的跪垫上站起，走近这尊雕像，去抚摸、敲打以至解剖。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集合体，正在被重新认识、重新雕塑。在这一过程的进行中，我们会愈来愈清晰地看到，鲁迅体内交织着那么多相互矛盾的二重性格，诱使我们去进一步开掘、分析与探讨。最终将会发现，正是这些对立统一二重性格，组成了鲁迅这一伟大而复杂的有机体。

鲁迅的言语之间、行动之间以及言与行之间，常常涂满着矛盾色彩。他最喜欢把两个反义的概念、现象并列在一处。如“为了忘却的纪念”，“于无声处听惊雷”，“炎天凛夜长”等等。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好象很不一致。他一方面说文艺不能“俯就大众”、“媚悦大众”，说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另一方面又主张“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一会儿肯定“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一会儿又说要“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一面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一面又说“无产者无论写什么，都有贡献意义”。（《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的一些做法也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他到日本留学，是弘文学院江南班里最早剪掉象征封建压迫的辮子的，并且拍了断发照片同时寄给周作人和许寿裳。但是他1905年暑假回国，却装上了假辮子。当日本学生以教员漏辮说鲁迅的暗喻侮辱他时，他一面提出强硬的抗议，消灭了流言，另一面却又妥协式地退还了匿名信。他一方面能够宽容那些伤害过他的种种青年、文人。另一面却又坚持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费厄泼赖”。鲁迅认为人生是苦的，可他又不肯逃避，而是“专和痛苦捣乱”，在奋斗中寻找乐趣，不像周作人、林语堂等主张无所作为。他认为艺术是苦的，却偏偏抛弃了医学来搞艺术。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大加挾伐，甚至主张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另一方面，却又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写了

《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他既相信未来会有“黄金世界”，又认为“将来会变成现在”，“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既对世人满腔热血，却又总怀着“人心惟危”的念头。他既担心与“害马”的爱情会影响了战斗，却又没能像《野草》中的“过客”那样拒绝了小女孩的布……

总之，他既爽朗，又阴郁；既豁达，又念仇；既果断，又彷徨；既机智，又呆板；既深刻，又幼稚；既诚实，又狡黠……几乎一切中国人视为两极的品性都被他力挽双驹地融为一炉。

以上所举的鲁迅性格的种种矛盾表现，并非是他一人所偶然独具的。在许多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都可发现这样那样的性格矛盾。如李大钊作为向一切封建传统宣战的最前列的勇士，却与旧式婚姻结合的夫人相敬如宾。郁达夫在文坛上声名日振，生活上却沉沦难以自拔。纵观世界历史，每一变革时期的先觉者，不论是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新人”，日本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大师，欧美文学史上的所谓“垮掉的一代”，还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各自表现出具有时代烙印的性格两重性，只不过这一点在鲁迅身上体现得尤为全面和醒目罢了。

鲁迅的二重性格首先是时代的反映。“五四”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国外各种文化蜂拥而入，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的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投影到这块昏睡百年的土地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巨大的喘息抗拒着、挣扎着，同时也不得不容纳着，吸收着。最古老、陈旧的，与最年青、崭新的，在同一狭小的时空里进行着决战。各种势力、各种阶层的代表思想鱼龙混杂，在同一舞台上演着千种百戏。各种矛盾的思想犬牙交错，互相影响与被影响，形成大大小小的矛盾思想体系。所有这些矛盾思想体系的合力矢量，就是这场决战的总趋势。而这个总趋势，必然要反映到最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某些、某一个由若干人甚至是一个人构成的思想体系上，那么，这个人，就正是鲁迅。

这种历史角度的偶然性转到个人角度就又具有了必然

性。恩格斯说人的性格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鲁迅的这种二重性格也不例外。社会关系中的关键部分是教育，鲁迅所受的教育正是一个庞大的矛盾体系。他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斤上联着“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的对联，从小读的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鉴略》，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后来又就学于章太炎，造诣日深，古文运用得游刃有余。不仅能写出《斯巴达之魂》那样字字金石的文言小说和《摩罗诗力说》那样远斤成风的方言宏著，而且连自诩国粹大师的章士钊之流也被鲁迅在“小学”方面所击败。但另一方面，鲁迅又接受了世界上一切最新的思想。进化论的影响他终生也未能完全摆脱。他学过矿业，学过医学，而且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和生理卫生教员时，给学生们讲解生殖系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破天荒之举。他不仅翻译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而且还介绍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如居里夫妇发现的镭。鲁迅除了得到正式教育外，受各种民间文化的熏陶也很深厚，形成了他那种真正全民的文化观。所以鲁迅不仅精通子曰诗云，也懂声光电；既背过“非礼勿视”，也看过衍太太的春画；既明了佛门弟子的普渡众生，也牢记吴越祖先的复仇雪耻，既肯定“民亦载舟，民亦覆舟”，又大力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一切对立的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互相消长着。

鲁迅的人际关系网也是复杂的。有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有发动复古的章太炎、章士钊，还有趋向恬淡幽默的周作人、林语堂。有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沈钧儒；也有目不识丁的章运水和阿长。有最先进、解放的新女性许广平、刘和珍、萧红，也有仍戴着封建枷锁的母亲鲁瑞和朱安夫人。有正直善良的左翼青年柔石，也有吮血肥己的另一类“文学混混”。这些活生生的人对鲁迅产生的影响也许比书本更大，鲁迅对待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多的人必须要采用不同的交往态度和交往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片矛盾的环境土壤。

鲁迅的个人经历也一直是顺境与逆境交织。幼年的家庭人欢书朗，接着忽然由“小康陷入困顿”。鲁迅求学江

南水师学堂，是被人视作走投无路，只得将灵魂“卖给洋鬼子”的，母亲只能给他筹办了八元川资。临近毕业又前途暗淡时，他又有幸被派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由寂寞转为呐喊，弃医从文。归国后又陷于沉寂。婚姻问题的烦恼，兄弟失和，自己在社会上名声日衰，被视为“思想界的权威”，却又只能“忍看朋辈成新鬼”；南北流寓，与许广平的结合，投入无产阶级的营垒，却又遭遭背后的冷箭……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铸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观。

时代的要求加上鲁迅的个人条件产生了他复杂的二重性格体系。他的精神之所以能够代表我们民族，是因为这种二重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多元归一的倾向。中国文化能够长期保持海绵性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一个辩证思维的指导机制，虽然它有时堕落为中庸之道。这种民族性的辩证思维能够轻易地吞噬掉单一的外来文化侵袭。而当它受到四面八方扑来的与它相矛盾、而且自己之间也相互矛盾的文化大围攻时，便表现出时左时右，进退不定的矛盾状态，实际上是以无数个局部的矫枉过来与其结果的互相消长达到整体上的本质稳定和海绵体的良性膨胀。这个过程就是无数个两极对立和总体上由渐进而渐变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看到鲁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处，而又觉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统一的原因。鲁迅在其性格各个侧面的种种矛盾的推动下，整体思想上一步步接近了时代的制高点，最后成为了一名冲锋陷阵的民族战士。他的性格达到了一个新的统一高峰。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其种种典型的二重性格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消长。因此，他的二重性格决不能妄谈为无一定之规的二重性格，甚至是只为人人利益的实用主义。正是这种二重性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造就了这样一个大思想家，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结晶，因此，我们说这种二重性格是伟大的。这一伟大性直到今天还似乎仰不可及，固然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但要承认，无论“黄金世界”何时到来，鲁迅永远不会消逝的，他的二重性格已经沦浸到我们的血液中，代代相传了。

（上接第4版）

我们主要到过两个地方：陕西西安和贵州的黔东南州。18日和19日在西安，我们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兵马俑，另一个是位于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西安的机场在咸阳，距离西安大约30多公里的样子。如果以西安为中心，那么咸阳、兵马俑以及杨凌就是分别位于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上，路线很有一些别扭，基本上都要走回头路。幸好西安的朋友王恩胡教授帮助找到一位很好的司机，非常热情还毫无怨言。王教授和我只是萍水相逢，原先本不认识，他只是向我问过一个问题，但我却直接向他提出了接待外宾的请求，殊为不易。在西安，他们不仅请我们在西安饭庄喝两酒，吃西安小吃，还亲自陪同我们到杨凌去。可惜老外只是喜欢中国的大众化美食，对地方小吃没有什么感觉。伯格曼先生每到一处，只有三样要求，其他都听我们的，那就是米饭、叉子和板凳（洗澡时用的）。后来我都习惯了，事先替他安排好。还是中国人

好客。一些餐厅里没有叉子，就是出去借或买，也要给提供上。

在兵马俑，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国旅游的变味。兵马俑本来是一个展示中国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很好展台，可是给我们大家还是留下了“一丘之貉”的感觉，罪魁在于这里的太过浓厚的商业氛围。从停车场到博物馆入口，大约有1公里的距离，两边都是林立的商铺，展卖劣质的兵马俑仿制品，成堆的英语推销导游涌向你，用蹩脚的英语推销翻译，或者怂恿你去坐电瓶车，或者坐轮椅（因为伯格曼先生拄着拐棍）。他们大概是事先做过功课，目不斜视，对于导游不屑一顾，坚决不要，宁愿自己去“看”和“品味”。伯格曼先生倒也不俗，进去以后不仅给我们作导游，还给一位外国女孩讲解了一番。在兵马俑里，他们最高兴的莫过于看到了一个咖啡厅，他们想喝咖啡大概和很多中国人想念开水和茶一样吧。不过，他们又说咖啡太贵了，二十多元一杯。我问是不是用速溶咖啡冲

出来的，荷兰人说不是，是真正的咖啡。我想那还贵吗？

欧洲人的节俭真是名不虚传。给他们找到了150元的宾馆他们很高兴，可以却嫌两天1300元的包车贵了。我问他怎么还觉得贵，他们说：因为宾馆这么便宜呀！

杨凌与研究生们座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是伯格曼先生以前到过的地方，所以这次他还要故地重游。学校给安排了一批研究生和我们座谈，一多半是博士生，小半是硕士生，以女生为主，多数的英语都很好。我们谈到了农村的金融问题、农作物保险问题、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土地制度问题等等。大家相谈甚欢，伯格曼先生很喜欢这样的风格，还感慨这么女生可以上学深造。中午在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吃自助餐，也有一些加菜，大家也很喜欢，因为这样就沒有浪费了。在学校附近，我们还参观了农业博览园，展示了昆虫、土壤、机械、作物、动物等农业科普知识，有非常好的教育功能，但是门票的价格有点贵。（未完待续）

《骑车是一种品位》有奖征文

我们骑手去

《光明日报》薄洁萍 博士

为了送希希（女儿的小名）上幼儿园，5月我买了一辆既结实又漂亮的自行车，粉色的车身，灰色的座桶，流线型的车体，变速车轴，骑起来既快又轻巧，我和希希都喜欢它。它从此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去社区图书馆借书还书、亲子班上课，到菜市场买菜、超市购物，甚至什么也不干，就是在小区里溜达，希希都会说“妈妈，我们骑车去”，说着就会自己爬上自行车后架，坐在专门给她安好的小椅子上，双手抓紧把手，等着我推她出门。

临近9月，为了方便人接送孩子，亲戚又送了我们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这下我们家那辆小汽车算处于半退休的状态了，因为唯一的驾驶员——孩子的爸爸也改骑自行车行了。9月1号希希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我骑车带着她，爱人骑车驮着被褥衣服，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也算浩浩荡荡地出了门。希希坐在后面，开心地像只小鸟，她还从末体验到这种架势，爸爸紧跟在她的旁边，时不时地朝她做个鬼脸，逗她咯咯地笑。我们的心情也像飞快旋转的车轮一样愉悦高兴。

一路上却并不好走，正赶上上班上学高峰，人流车流挤在小胡同里，步行的人见缝就溜，骑车的人则左拐右躲，只有开车的人望路兴叹，一脸无奈。我骑车技术不高，稍有不顺就跳下车推着走，并反复告诉希希坐好，手抓手牢的。就这样，虽是汗流浹背，但快过汽车，也快过行人，我们按点到达了幼儿园。女儿是幼儿园里的新生，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对于她来说，小小的人生将掀开新的一页，从此离开朝夕相伴的家人，开始过一种集体生活。所以，那一天，当我把她从自行车上抱下来送进班级时，我觉得我是在把她带进了一个新起点，新天地。

从此的每一天早晨，我或爱人骑车带着希希行进在北京繁忙拥挤的大街小巷，有时感受着迎面而来的初秋的凉风，有时则顶着仲秋却依然火热的太阳，有时却是小雨裹挟着落叶轻触着我们的脸庞。女儿坐在后面，有时高兴地叫着，有时唱着不知名的歌；遇上下雨天，则躲在大人的雨披下面，乖乖坐着一动不动。十几分钟的路程虽然充满拥堵，充满城市的喧嚣，有时也夹杂着惊

险，但在我却永远是一种享受。我在自行车上享受着女儿的成长过程，女儿则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一天天长大；上幼儿园不再哭，会写“上、下”，会给我上艺术创想课。

渐渐地我们的生活在自行车的驮载下也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走亲访友，参观游览，逛公园去商场，都是骑车去。女儿当然早已喜欢上这样的旅行方式，骑车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需求，一种时尚。不必操心等车挤车，不用担心堵车，也不用费心在哪个停车，想上哪上哪，想停哪停哪。两脚生风，虽没有坐地日行八万里之感，却有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志。

唯一的担心是害怕它们被偷，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坐电梯把它们放到家里，早晨再坐电梯下去。有时遇上梯高峰，被挤在里面，有好心人帮忙还可以顺利出梯；遇上各扫门前雪的主，他前脚抬腿走人，我们则眼睁睁看着电梯因时间到而悠忽地自行关闭。不过上还是热人心人，一时生气，多时顺气。不管怎样，出行的理念依然是“我们骑车去。”

“骑车是一种品位”有奖征文

——后现代绿色出行活动”有奖征文

汽车所引发的一系列环境，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用了多久北京上海等一个又一个美丽时髦的都市就会沦为丑陋的停车场，已不是什么耸人听闻之谈。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到了有识之士考虑做点什么改变这一现状的时候了。“骑车是一种品位——后现代绿色出行活动”就是对这样一种呼唤的具体回应。

受消费主义大潮的影响，骑车被视为“穷人”的象征，“失败者”的代名词。而拥有私家车，开车则被看作成功的标志，是一种“时髦”。殊不知，这却是一种伪时髦，一种代价沉重的时髦，想一想它对环境带来的破坏，对心理带来的压力，对身体带来的戕害，就

会清楚地看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时髦。一种过了气的时髦。

而骑车则代表一种品位，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态度。它代表的是浪漫。你骑车说明你心系大自然。敢于向强权的消费主义说“不”。

据北京地球村主任廖晓义女士介绍，荷兰只有1500万人口，但却拥有自行车1600万辆。在那里从部长、市长到市民都是自行车族，骑车既便利也是一种时尚。

选择了骑车就是选择了自由。选择了骑车就是选择了浪漫。绿色出行的骑士们，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为了推动后现代绿色出行活动，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地球村与

《世界文化论坛》报联合举办《骑车是一种品位》有奖征文活动。征文内容：你与自行车的缘分，你对绿色出行的看法，你与自行车的故事。

征文要求：生动、可读、感人，体裁不限，2000字以内。

征稿时间：2007年9月8日至2009年12月30日。

《骑车是一种品位》征文设优秀奖20名，奖品为绿色自行车一辆。

来稿请寄：《世界文化论坛》报电子邮箱：

info@postmodernchina.org

ipdclaremont@yahoo.com

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与，谢谢！

（上接第1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给本次大会的贺信中所指出的，发展生态农业、建设两型农村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生态农业发展问题作为切入点，组织国内外专家就此展开研讨，主题鲜明、现实针对性强，必将对指导全国两型社会特别是两型农村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在“为中国摸索经验，为世界贡献力量”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农村是人类生存之源地，农业是经济发展之基石，发展生态农业是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保障，也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境遇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历程里，世界各国需要认真面对、共同探讨的发展问题。难能可贵的是，确实如何来落实院这么女生可以上学深造。中午在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吃自助餐，也有一些加菜，大家也很喜欢，因为这样就沒有浪费了。在学校附近，我们还参观了农业博览园，展示了昆虫、土壤、机械、作物、动物等农业科普知识，有非常好的教育功能，但是门票的价格有点贵。（未完待续）

美国阿肯色大学洛克菲勒研究院项目主任乔安娜·赛伯特（Joanna E. Seibert）通过自己在阿肯色州小农场服务项目的工作经历，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重新发展后现代农业的努力。小农场教育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小规模的可持续农业是必要的，它能够让我们知道食物从哪里来，让我们记住农民是多么重要，是一种既能确保保存农耕传统遗产，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又能够建立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社区，振兴农村社区的社区、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后现代农业及后现代农村生活方式。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从哲学视角在题为《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农业》的主题报告中指出，现代农业存在许多弊端，比如对天人合一、太极拳、果基鱼塘等传统农业智慧的抛弃，导致对土地的严重伤害及对社区生活的极度破坏。

王博士强调指出：虽然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以牺牲8亿农民为代价的发展未免太残酷了，一个以牺牲广大农民的幸福和自然的健康为代价的农业发展模式是成问题的，甚至是荒谬的，它是“物本主义”登峰造极者，中美合作是可能的且有必要的，因为有限资源即将枯竭这是全球化的事实。土地学院将对各国提供帮助，比如将免费提供胚质，以及30多年研究多年生作物的经验。

佛罗伊登博格博士认为，21世纪的挑战是，在人口史无前例扩张，基于不可持续能源技术之上的全球文明以及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化背景下，如何发展一种可持续的农业，即后现代的农业，此种选择对于中国而言尤为重要。应该将农业看作是多功能实践行中的复合体，要在农业科学、技术和政策中实现基本的转变，由服务于试图工业化如何规划和操作生产体系的农业产业化的需要转向服务于强调生产体系复杂性的农业生态学

的需要。农业生态学强调四个主要功能：生态体系服务、粮食生产体系（向历史和自然学习）、农民和农村社区及支撑农业的当地、区域和国家的基础设施。并且四种功能的规划要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真正良好的、可持续的农业是后现代的，它能够作为生物社区及生态系统的美、完整和谐做贡献。来自美国的专家学者们主要从实践及个案研究层面探讨了可持续农业、生态农业和后现代农业问题。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农业学院院长、美国高校农业及可再生资源协会董事莱斯特·杨（Lester C. Young）向大家介绍了加利福尼亚的可持续农业。他说尽管加州农业取得了经济和技术上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很多环境、社会和政治的挑战，问题源于当前的现代农业。真正的可持续农业应该包含三个主要目标，即环境健康、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平等，这需要在最广泛意义上将跨学科的方法融合起来，并且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农民、土地所有者、农场工人、消费者、研究人员、决策者和其他人共同参与。

美国“国际小母牛”培训项目主任、著名生态学家阿克（Jerry Aaker），运用中美洲农业生态项目的案例，以及小母牛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及运用情况，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和大家分享了农村发展项目的计划和管理流程中用到的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即强调整合5个重要层面物质、心理、精神、社会和生态的“整体视角”，包括“认识现状、展望未来、制定计划、管理和监测”4个步骤的以价值为基础的社区综合发展方法，为中国农村发展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能：生态体系服务、粮食生产体系（向历史和自然学习）、农民和农村社区及支撑农业的当地、区域和国家的基础设施。并且四种功能的规划要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真正良好的、可持续的农业是后现代的，它能够作为生物社区及生态系统的美、完整和谐做贡献。

来自美国的专家学者们主要从实践及个案研究层面探讨了可持续农业、生态农业和后现代农业问题。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农业学院院长、美国高校农业及可再生资源协会董事莱斯特·杨（Lester C. Young）向大家介绍了加利福尼亚的可持续农业。他说尽管加州农业取得了经济和技术上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很多环境、社会和政治的挑战，问题源于当前的现代农业。真正的可持续农业应该包含三个主要目标，即环境健康、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平等，这需要在最广泛意义上将跨学科的方法融合起来，并且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农民、土地所有者、农场工人、消费者、研究人员、决策者和其他人共同参与。

美国“国际小母牛”培训项目主任、著名生态学家阿克（Jerry Aaker），运用中美洲农业生态项目的案例，以及小母牛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及运用情况，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和大家分享了农村发展项目的计划和管理流程中用到的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即强调整合5个重要层面物质、心理、精神、社会和生态的“整体视角”，包括“认识现状、展望未来、制定计划、管理和监测”4个步骤的以价值为基础的社区综合发展方法，为中国农村发展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美国阿肯色大学洛克菲勒研究院项目主任乔安娜·赛伯特（Joanna E. Seibert）通过自己在阿肯色州小农场服务项目的工作经历，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重新发展后现代农业的努力。小农场教育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小规模的可持续农业是必要的，它能够让我们知道食物从哪里来，让我们记住农民是多么重要，是一种既能确保保存农耕传统遗产，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又能够建立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社区，振兴农村社区的社区、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后现代农业及后现代农村生活方式。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从哲学视角在题为《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农业》的主题报告中指出，现代农业存在许多弊端，比如对天人合一、太极拳、果基鱼塘等传统农业智慧的抛弃，导致对土地的严重伤害及对社区生活的极度破坏。

王博士强调指出：虽然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以牺牲8亿农民为代价的发展未免太残酷了，一个以牺牲广大农民的幸福和自然的健康为代价的农业发展模式是成问题的，甚至是荒谬的，它是“物本主义”登峰造极者，中美合作是可能的且有必要的，因为有限资源即将枯竭这是全球化的事实。土地学院将对各国提供帮助，比如将免费提供胚质，以及30多年研究多年生作物的经验。

佛罗伊登博格博士认为，21世纪的挑战是，在人口史无前例扩张，基于不可持续能源技术之上的全球文明以及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化背景下，如何发展一种可持续的农业，即后现代的农业，此种选择对于中国而言尤为重要。应该将农业看作是多功能实践行中的复合体，要在农业科学、技术和政策中实现基本的转变，由服务于试图工业化如何规划和操作生产体系的农业产业化的需要转向服务于强调生产体系复杂性的农业生态学

的需要。农业生态学强调四个主要功能：生态体系服务、粮食生产体系（向历史和自然学习）、农民和农村社区及支撑农业的当地、区域和国家的基础设施。并且四种功能的规划要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真正良好的、可持续的农业是后现代的，它能够作为生物社区及生态系统的美、完整和谐做贡献。来自美国的专家学者们主要从实践及个案研究层面探讨了可持续农业、生态农业和后现代农业问题。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农业学院院长、美国高校农业及可再生资源协会董事莱斯特·杨（Lester C. Young）向大家介绍了加利福尼亚的可持续农业。他说尽管加州农业取得了经济和技术上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很多环境、社会和政治的挑战，问题源于当前的现代农业。真正的可持续农业应该包含三个主要目标，即环境健康、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平等，这需要在最广泛意义上将跨学科的方法融合起来，并且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农民、土地所有者、农场工人、消费者、研究人员、决策者和其他人共同参与。

美国“国际小母牛”培训项目主任、著名生态学家阿克（Jerry Aaker），运用中美洲农业生态项目的案例，以及小母牛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及运用情况，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和大家分享了农村发展项目的计划和管理流程中用到的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即强调整合5个重要层面物质、心理、精神、社会和生态的“整体视角”，包括“认识现状、展望未来、制定计划、管理和监测”4个步骤的以价值为基础的社区综合发展方法，为中国农村发展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董慧，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

赵紫宸：一个拥有多元视野的中国世界公民

[洛杉矶] 胡仲扬（Franklin J. Woo）博士 王琨 盛栩铮 译

赵紫宸（1888—1979）是一位受理学熏陶却很大程度上又受中国佛教、道教文化影响的中国基督教徒。作为一个身处动乱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期望与抱负就是能找到一股力量和灵感来实现他的价值理念。通过融合基督教信仰和中国传统文化，引领两者相互摄含，推动多元世界的更大包容，赵紫宸具有一个真正世界公民的所有素质，为最大的共同福祉做出了贡献。

一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米尔·亨廷顿（1927-2008）曾预测，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世界将出现文明冲突。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亨廷顿强烈地感觉到，美国人应更加关注美利坚民族的认同感。在他的著作《我们是谁》（出版于2004年）一书中，他声称美国人未必在宗教上都是盎格鲁·萨克逊教徒，但在文化价值上肯定是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的。如果只有250多年历史的国家的学者能得出这样的判断，那么有几千年儒家历史和六百年理学支配史的中国人，又该有多少论断可以提出呢？1313年，元朝政府确定朱熹（1130-1200）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14世纪朱熹理学支配朝鲜李朝。17世纪理学传到韩国传到日本，文对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1905年由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赵紫宸生于1888年，他在传统教育熏陶下长大，可以说他的基本价值观完全受理学的影响。

二

自我修养在新儒学中是至关重要的。在新儒学中，自我修养绝不认为是个体脱离社会关系的过程。“成人”（仁）需要在社群中实现，就像非洲土著居民喜欢讲的“建成村落是为了培养孩子”。在中国传统中，知识就是在“学会如何生活”的智慧（学生在相互关系中达到学习成人的目的）。儒家的榜样就是向越来越大的关系圈实现最大的共同的福祉，这种榜样体现在《大学》中。宋代理学家范仲淹（公元989—1052）给几代忧国忧民的东亚学者树立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耶稣的生活和基督教团体中，赵紫宸找到了将新儒学的理想追求推广到全球甚至全宇宙的奋斗灵感和契合点。他在生活中逐渐明白，要提升自我修养，离不开来自外界的帮助。

儒家思想十分强调“恕”（“恕”要求推己及人，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强加给别人。在孔子的有关伦理学说中，“忠”与“恕”是并列的。有“恕”谓得“忠”，为“忠”以行“恕”。“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是“仁”的内容。同时又是孔子思想的一贯之道。”）收到礼物、回赠礼物是件自然的结果（这也暗示着：当人们受到不好对待之时，人们也会寻机报复）。儒家思想中的互惠主义观念影响了人们，以至于他们反对人们从上帝那里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得恩典，比如上帝将拯救作为礼物赠给一个犯有恶行的罪人。儒家思想并没有期待得到任何不是应得或不能努力便得到的免费午餐。“我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上帝的爱呢？”有人会问，“什么都不用做。”这

是基督教的恩典概念给人们的标准答案，但此答案对持儒家思想的人来说，便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从积极的一面说，这种强调互惠兼爱的思想，使得行动离不开理论的指引。也就是说，知识和行动达致统一。一如王阳明（1427—1529）的“知行合一”理念。因着对体现上帝恩典的“恕”的强调，赵紫宸的基督教逐渐关注的重点放在基督生活的具体行动中。因着对儒家“恕”的概念的强调，赵紫宸逐对保罗神学中的“上帝恩典”概念给予了更加实质性的具体阐释。正如某新约学者指出的，赵紫宸给保罗传道者提供了一种“坚实的伦理学”。

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生的数量大约有40万人，占4亿人口的0.1%¹⁰。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集团，大学生不可避免地承担着改善中国人民的福利和改变国家命运的“儒家式”的责任。在1973年，笔者首次去他北京的家回访，我告诉他我是多么喜欢他的书。他很快回答道，“它们是没有用的！”他看到自己过去的作品，不亚于看到偶像崇拜的语言，觉得不实际。然后他问了一个既实际又很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宗教有什么用？”，“科学才是今天中国需要的！”

我认为，他在宗教上的言论可能是基于大众化的思考，而他关于科学的言论，我相信是出自他的真心的。1919年赵氏才三十出头，他是五四一代对西方民主理想幻灭的一员，目睹德国的战败和日本对中国的投降，他突然觉悟了，认为科学才是中国解决问题的关键。

然而，这个主导和影响世界400多年的“现代科学”，虽然从根本上讲是有瑕疵的，但中国学者（包括赵）接受它时并无察觉。近一个世纪前，怀特海（1861—1947）在其著名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批评科学是“误置具体的谬误”，这源于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和机械主义的世界观，它没有给无法定量分析的人类价值留下空间。对怀特海来说，科学是“反理性”的，因为理性应当包括所有人类经验，其中包括人类价值，文化，宗教和伦理道德等非感知的及直觉的领域，并通过艺术、诗歌、音乐，舞蹈等形式体现出来。

20世纪50年代，许多善于思考的西方人感到，现代化和工业化需要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伯特·贝拉发现了与新教工作伦理相对应的东西方文化精神，认为此精神使日本通过科技实现现代化，而且它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灵丹妙药。他从儒家文化中发现了这种精神并研究了日本儒学家土田梅岩（1685—1744）的思想。然而，三十年之后，贝拉开始对视现代化为灵丹妙药的想法表示怀疑。看到使日本现代化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正在被现代化过程本身迅速腐蚀。他意识到自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四、

当今中国强调经济的增长，却无形之中牺牲了中国丰富的人文价值传统。于是，有了儒

学在中国的复兴。正如约翰·梅卡姆在《失去的灵魂：当代学术话语中的儒家》（哈佛大学，2008年）指出的，不仅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对儒学感兴趣。事实上，台湾、香港的学者以及中国境内的美国学者都在共同努力倡导儒学。这种努力不仅是精神上的鼓励，更多的是中国政府的支持。同时，与梅卡姆有限的儒学学术话语相反，随着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的于丹教授在电视上讲授《论语》，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尽管还处在表面水平）迅速高涨。而她关于讲解儒学的书籍（正版的和盗版）也已销售数千万册了。

贝丹宁教授的《中国新儒家：转型社会的政治与日常生活》一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是从他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政治学与伦理学教授的特殊职位写起的。他也在新加坡和香港大学任教。1991年在牛津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论文是关于社群主义。社群主义是抵抗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种可行性原则。2000年，他发表了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批判。其中的例子是：李光耀深受法家传统的启发，通过运用和借鉴儒学，建立一个严刑峻的新加坡政府。但由于中国文革十年大肆批判孔子，认为孔子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当时并没有用孔子的名义来阐明儒学。但中国政府还是看到了新加坡稳定团结的政府模式的可行性。像所有混合思想家一样，贝丹宁认为自己是“住在北京的加拿大儒家”（《中国新儒家》第148页）。

今天，无论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儒家价值观，还是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任何世界价值体系，能否最终抵消根深蒂固的现代科学的片面人生观，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17世纪清帝国的人文通过排挤（耶稣会）传教士来抵制西方科学。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仅仅接受小部分的科学，因为他们能帮助确保人的关系的价值和作为共同福祉的经世计划。虽然，西方科学作为外国的东西，但它却是“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虽然不应否认现代科学为人类带来一切好东西，尤其是潜在着一个通过交流、旅行而成为易接受的世界。但是，那些坚持保持中国文化价值的儒家文人们的抵抗是正确的。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全球变暖的威胁，核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加大。由于有缺陷的支配一切的经济，国家之间或者是国家内部之间都成了金钱的关系，就像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竞争那样——现代科学和无限度的经济发展更强化了这一关系。17世纪的中国，在抵制的时候又适当选择了由耶稣会士带来的现代科学，这是正确的。但是，19世纪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中国在鸦片战争（1842）和甲午战争（1895）失利后，现代科学就成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武器。今天，人民共和国正在临近它现代化进程的第四个十年，这个进程仍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程度还会在进一步加深。

在美国加州有个过程研究中心，大卫·格里芬（1939—¹¹）数十年来一直在那里从事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该研究把科学和宗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怀特海过程思想是开放的、灵活的、全面的。在观察实时，过程思

维为新方法和新理论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哲学工具，它可弥补被忽略或再次失去的像新儒学那样的传统价值观。2002年关于过程思想的国际会议首次在中国大陆召开。北京会议后，克莱蒙过程中心成功的让中国大学建立了至少二十个过程思想中心，它们为复兴中国及其它传统而提供了思想框架。这无疑将影响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其神学中心的神学重建工程。

柯布教授（1925—¹²）是过程研究中心的有力支持者。退休以后，他还在美国、中国、印度以及欧洲各地讲学。他给怀特海过程思想一个简明的概括：现代思想重点在描述事实，它倾向于把价值与事实分开，认为价值判断基本是武断的。怀特海设想重新把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按照过程思想，世界是由现实在构成的，这些实在既对它们自身有价值，又对别的实在有价值。对世界的描述不是叙述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就是预示未来价值的增加或减少。过程思想强调，人类的行应该是指向以某种方式增加世界的实际价值，而不是破坏价值¹³。正是因为这些各种威胁，人类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而这些威胁的发生，是由于人们片面的利用科技带来的现代化。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的柯布、格里芬还有其他哲学家，对于哲学重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哲学重建的方向，是为了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星球。

五

在燕京大学工作期间，赵紫宸发现，燕京大学是包含了不同视野和理想的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不同文化、宗教的人可以在一起生活、学习和工作。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改造，这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典范。“挽救中国”是燕京大学的重要目标。今天，多种文化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启迪是急需的。因为经济不公平、文化隔阂、核战争的威胁和生态环境快速退化使得全球化的世界面临破碎，“拯救地球”应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最关心的事情。

几个世纪以来，现代科学作为主导模式，支配着人们感知实在的方式。在世界诸大学中，植根现代科学的认知方式应该扩展到包括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哥伦比亚大学的菲利普·菲尼克斯就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研究显示了学术界研究方法的局限和缺陷。25年后，他的继任者，道格拉斯·斯隆重建了包括生命维度（此被现代科学所忽略）在内的认识论。他的原创性的雄心勃勃的工作体现在他的书的标题中：“解放思想 and 现代世界”。他提供了一个更丰富全面的人生观，包括感知，想象，直觉和道德规范。斯隆关于认识论的研究对于全世界的大学（包括已将基督教大学如燕京大学吸纳进其政治和学术体系的今日中国大学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要改变几个世纪以来由现代科学所支配的感知实在的方式，仅靠几篇学术论文是不够的，也许除了海啸味的灾难就没有什么能把人类从习以为常的傲慢自大中解脱出来。

全球范围的组织机构如联合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将会加速为全人类共同的福祉所做的文化对话的进程。双文化、多元文化和混合文化，似乎不仅是多元化美国的文化，也是整个地球村的共同主题。如何生存、繁荣和相互

合作，对于人类和地球的生存是时代的挑战。赵紫宸是中西融通的学者，并在燕京大学时就为基督教与儒学的相互融合而呐喊。如他分别对《以弗所书》中的“一切归于我主”和《大学》中的“平天下”进行相互阐释。

赵紫宸是一位真正的混合基督徒，他不仅是地道的理学家，他部分还是佛教徒和道教徒。1978年，我再次去北京到他家访问时，他正为妻子办丧事。他跟我这么说：“我感到很悲伤，同时我也很开心。”他又用典型的哲学范式问道：“这是不是个悖论呢？”接着他又解释说，“我悲伤，是因为她不在我身边了。我高兴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她了！”赵氏的这种带着欢喜的悲伤让我感到基督上帝永远爱我们。他同时也表示，是佛教不执着、不执迷的思想让他泰然自若。他也让我想起庄子，记得庄子妻子过世的时候，他唱着歌，敲着鼓，因为他知道他的妻子又回到了道的源头。

混合的人需要一个关于自我理解和定义的参考体系。在美国卫理公会福音神学院教新约的马来西亚人K.K.Yeo，在伊利诺斯州的埃文斯顿建立了一种混合神学。他用《论语》来解释基督教传教士保罗的文本。赵紫宸在这两方面都是非常娴熟的。在自传性创造的经典诠释过程中，“儒家伦理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而保罗的教义塑造了基督教世界。”²³

现今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文化认同是什么呢？根据亨廷顿的理论，理学就像是中国文化的DNA，是决定性的。可以说，理学是中国文化价值的核心，但是道教和佛教（在一世纪的时候传入中国）的影响在中国生活中依然存在。事实上，国务院宗教事务局(SARA)将佛教和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基督教列为中国五大宗教传统。在中国人看来，儒学并未被视为一种“宗教”。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虽然是以理学为核心的，但仍借鉴了“大同釜”，其中融合了佛教和道教思想，也有基督教（新教徒，或者东正教，或罗马天主教，或福音派），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将会找到一种融合的文化以满足混合时代的需求。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是不剑桥大学著名学者。他写了24册关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巨著。他指出，“四千多年前，当我们还混沌无知的时候，中国人就知道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很多有益的事情。”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遍布世界各地。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有个问题至今一直困扰他，即“中国如何能在欧洲人的科学革命之前就了解人类和自然，并且利用自然造福人类？”作为一个混合基督教信仰的儒学家赵紫宸，如果今天他还活着，无疑他会首先担心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和地球这个问题。然而，他在1973年对我说“科学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但世界包括中国想知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学是我们所需要的确呢？”

作者胡仲扬先生系原美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中国部主任，曾指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现居洛杉矶。

译者：浙江师范大学王琨教授、硕士研究生盛栩铮。

直击印度有机农业

——印度卡纳塔卡邦的田野调查随笔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石嫣 博士

2009年9月，我应邀参加在印度班加罗尔举办的“杰出有机农业技术大会(Outstand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echniques)”会议历时两天，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来自斯里兰卡、不丹、尼泊尔、孟加拉、埃塞俄比亚、马来西亚的50个有机农民以及来自印度的400多个有机农民，还有一些相关农业研究机构和政府官员参加。会议结束后，我到印度卡纳塔卡邦的农村做了一周关于印度有机农业和农村金融互助小组(Self Help Groups)的调查,收获颇多,觉得有必要与更多的人分享。

一、发端于农民的有机农业运动

印度与中国同样有着几千年的农业耕作历史，但随着殖民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发达国家的农业公司以“绿色革命”的方式，向印度推进依赖石油的农业体系，施加给印度一套高成本的灌溉、施肥、杀虫的农业体系，高成本的农业体系依赖于极高的外部投入，农药和化肥这些石油产品的原材料需要进口，其中，包括约40%的氮肥、97%的磷肥和100%的钾肥，而由于化肥的溶解和吸收需要水，于是就需高投资的人工灌溉系统，造成了对河流生态的破坏；农业大机械的使用，也迫使农民不得不得使用破坏土壤的单一化、规模化种植方式。

这一套通过绿色革命推动的农业体系虽然提高了产量，但由于这些方式的高投入及特殊的品种针对性，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印度人的“饥饿”，不过却给因二战后急于将战争中生产炸药、武器等原料生产转型为以这些原料为基础的化肥、农药生产的农业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越来越多的农民因无法承担这样一个高成本的农业体系1966年以来，印度在农业中的各种现代投入，逐年快速增长。据

统计，自1966年至1978年，印度在农业中就化肥、农药、柴油和电力等的资本投入，每年的递增率就达10%；相比之下，其传统投入每年仅增长1%。至1976—1977年度，现代投入已占农业总产值的10.84%。当绿色革命所带来的产量提高已经接近瓶颈时，基因革命再次将农业生产带入了一个不确定领域。制度成本的承担者与制度收益的享有者极其不对称，农民需要更多的依赖银行、外部种子、农业公司、推广中心、大型设备、大学科研人员而生存，也因此导致每年数以千计的农民因无法维持生计自杀。

于是，在有着比中国更强烈对比的所谓“现代”与“落后”农业体系的印度，一些仍然立足于大众科学的科学家，一些仍然将土地看做母亲的农民，一些仍然有清醒的头脑和社会良知的市民，希望拯救正在处于危机中的印度农业，一同推动这场属于印度人民的有机农业运动。

二、印度农民有机运动的几个主要内容

1. 核心原则

印度农民有机耕作的核心原则就是模仿森林生态系统。在自然界中，森林可以自己管理、生产、储存、提供全部的养分。人类并不能创造自然的森林，只能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模仿形成人工的森林系统。因此，有机耕作的技术基本都是通过模仿森林系统完成的。例如：通过模仿森林的覆盖系统，使用草对土地覆盖，保护土壤免于太阳直射、确保地下有益的微生物的存在；重视虫子的培育，本土品种的蚯蚓和微生物有利于土壤中的生物群落的增加；长期使用农药、化肥的结果，造成硝酸盐、亚硝酸盐、氯、钾在水中的富集，这种污染已经被证明与人的高铁血红

蛋白症、孕妇流产高度相关，通过在并边种植根扎的较深的植物，通过6-7年的时间可以修复已经被化学药品污染的水源。

2. 核心技术

第一，土壤和水的保持；第二，面对昆虫、草和植物疾病；第三，收集和使用有机种子。

3. 核心理念

有机农业是以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由于长期使用化学品，土壤中的碳含量减少，土壤的保水能力也降低，因此，有机耕作技术核心就是构建土壤，理解植物自身的防御机制，种植固氮植物，制作堆肥，使用绿肥，形成天敌，在天敌系统形成之前，种植味苦、臭味、有毒、多汁，不被牛羊所吃的药草植物。

三、与有机农业紧密相连的文化信仰

印度有机农业之父Dr. K Narayan Reddy告诉我们：土壤是活的有机体，土壤是有生命的，施肥不是为了让植物更好的生长，而是为了供给土地的营养。他把土地看做他的上帝。他说，农民种植食品先要为自己家人的健康着想，不要跟随金钱，当你真正这么做到这一点时，钱自然就会跟着你。给土壤施化肥、给植物喷农药就像笨小孩给妈妈喝毒药，然后再喝母亲的奶一样。

就我调查中访谈过的有机农民多数转变为有机耕作的原因是出于内心对有机农业的需求，对于土地的感情，或者受到某些有机农民精神的带动，而出于有机农业可以带来更高收入而转变种植方式的人并不多。

四、简单、低投入的有机耕作原则

印度有机农民告诉我们：别在乎那些被公司利用的有机概念，有机应该就是中印两国农民几千年农耕历史（下转第4版）

（上接第1版）效益的做法就是发展多年生农作物。

今天人们开始重视多年生植物的特点。多年生植物的根系往往超过两公尺深，是水质处理和碳、氮循环等生态功能的重要调节者。虽然它们也需消耗能量，来让足够的地底组织熬过冬天，但当天气变暖、土壤含有养份和水份时，多年生植物的深根又会马上活跃生长，这种随时预备的状态让它们具有高生产力，同时又能坚强应付环境压力。

举例来说，长达一世纪调查土壤侵蚀因素的研究发现，多年生牧草「猫尾草」维持表土养份的效力，是一年生草类的54倍。根据科学家的记录，种植苜蓿和混合多年生草类的土壤，与种植玉米和黄豆的土壤比较起来，水份流失减少5倍，硝酸盐流失减少35倍。较深的根系和较长的生长期，也让多年生植物的固碳效果比一年生作物多出50%以上，而碳可是土壤有机物质的主要成份。此外，多年生植物不需要每年种植，因此使用农业机具、杀虫剂及肥料的需求较低，可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于是在提高土壤肥力的同时，也降低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一年生农作物所需的除草剂费用比多年生农作物多了4.8.5倍，因此耕种多年生作物可降低农民支出。野生生物也同样获益，例如记录显示，多年生作物农田的鸟类分布密度，是一年生作物的7倍。或许对饥饿世界来说，多年生植物最重要的优势，是它们较能够在边际土地永续耕耘，那里的土壤质量原本就较差，或是在几年密集种植一年生农作物后，养份很快就会耗竭。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过去五年来，美国和其它地区的植物育种专家已展开研究和育种计划，想发展小麦、高粱、向日葵、中间偃麦草和其它多年生谷类作物。相较于一年生农作物的研究，多年生农作物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然而利用过去20~30年植物育科学的进展，相信在未来25~50年内，大规模种植高产量的多年生谷类作物，应该是可达成的目标。

现在我们实际上已能想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把农业从索取型经济转变成更新型经济。我们的建议显得雄心勃勃，然而它是必要而可能的。与其让气候的变化和矿物燃料时代的终止迫使我们作出调整，还不如我们来主动造成这一农业的转换。我们几乎不怀疑，相比之下，我们能更快地造成这一转换。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我们就有机会去解决其它问题。

将现在产粮食的土地的百分之七十多

年生植被化，这样做有可能会使土地的生产寿命从现在的数十年或数百年延长到数千年或数万年。新的多年生农作物，就像它们野生的同类一样，几乎必然更能适应气候的变化。毫无疑问，它们将更能吸收碳。它们不仅能保持地表和地里稀少的水的质量，而且将减缓土地的流失（正是土地的流失造成了沿海的死亡地带，极大地影响了渔业）。美国的食物保障将得到改善。有了安全的食物供应，才会有社会稳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在我们被迫面对气候、水、以及生物多样性这些交叉问题时，这会给我们赢得时间。

四、建议中美合作

我想提出一个我们两国都会接受的方案。如果我们两国合作，成功会来得更快。目前的农业中，对一年生农作物进行单作是很普遍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自然中的所有生态系统都以多年生植物的混合生长为特色。如果我们制止土壤侵蚀这样的严重问题，减少我们对矿物燃料的依赖，减缓土地和水的污染，我们就应培育多年生粮食作物。一个世纪来，生态学 and 进化生物学的文献汗牛充栋，或多或少都是为研究而研究。这是一大未经开发的资源，可资利用。生态学家已学会了识别形形色色生态系统的效用。生态系统成了我们的观念性工具。自然是如何运作土地的，这成了我们用来判别我们农业的标准。想象一下光谱的两端，一端是人类聪明，另一端是自然的智慧。在过去的100多年，工业精神一直不断地依赖人类的聪明。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聪明，而是说人类的聪明应服从自然的限制。

提出这一观点将是一大挑战。我们一万年种植粮食的历史一直是执着于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应征服自然或不顾自然。但这一态度导致了地球资源的无情的赤字开支。现在，我们终于面临着改变旧路子的问题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探究自然的那些被当代智慧发现了的、高效的变化过程。

这一对自然的关注从土壤本身开始。数千年来，自然已安排了20多种元素进入所有的生物。在整个大气层中，只发现其中的4种——碳、氢、氧、氮。我们的未来在于土壤之中。这使我想到这个问题：在创建一种新农业的这一努力中，为什么中国需要众多的实践者。

我建议，我们两国共同进行一项庞大的育种项目，旨在将那些目前占地球三分之一二农耕地、并为我们提供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热量的主要作物（主要是谷物和豆

类作物）改造成多年生的。同时我们也可对农业景观作生态方面的研究。育种专家尚未研究出可普及到农民的多年生粮食作物时，生态学家可用类似的物种与形形色色的混合作物和形形色色的根句型作试验，产生出形形色色的生态作用。在本文的开始，我们曾对美国建议以更多的多年生作物轮作，建立更多的牧场。该建议更是表明，我们的5年农业规划应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它标示了在50年内将美国的农耕地从80%的一年生农作物和20%的多年生农作物转变到20%的一年生农作物和80%的多年生农作物的这一历程。为实现这一任务，该建议呼吁美国资助80位博士级别的遗传学家/育种专家，以及30位生态学家。欢迎贵国做出同样努力，或者欢迎贵国采取自以为更为合适的方式推动此事。

全球性的努力已初露端倪。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土耳其正在研究多年生小麦。在中国，在土地学院的资助下，人们正在研究适于高原的多年生水稻。但是，这努力还需进一步增强。所以，很希望我们两国成为这一事业的全程合作者。虽然土地学院尚未考虑对各国的努力采取什么具体形式的资助，但我们可免费提供胚质，以及我们30多年研究多年生作物的经验。最近10年来，土地学院的同仁已大大改善了作物的多样性，并加快了改变的速度。我们现有小麦，高粱，向日葵和其它作物的杂交原型。我们也打算进一步研究出玉米和大豆的杂交原型。

我们与几家被政府授予土地的大学和机构已合作三十年了，现在我们土地学院的同仁深信，我们已拥有一大批研究者，他们懂得在农业中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是必要的。所以我希望，身处美国的我们能给这一改革提供我们的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较之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我们拥有更多的博士水准的遗传学家，育种专家，生态学家，以及进化生物学家。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使得大学拥有土地的制度成为可能。1887年的哈奇法案使得每个州都设立了试验站。1914年的史密斯-利弗法案规定了延伸服务。这一制度运行得很有效，但却只限于一个靠过度使用石油和其它不能更新的资源而迅速工业化的国家。这些有限资源即将耗尽，如今这已是可预见的事了。这迫使我们采取新的农业概念。我在这儿说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世界的农业制度在失败之前可能得到改革。

**作者为世界著名农学家，美国堪萨斯土地研究院院长*

***译者周邦宪先生为我国著名翻译家。*

